



元史 浅说



高荣盛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高荣盛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元史浅识 / 高荣盛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729-335-4

I. ①元… II. ①高… III. ①中国—古代史—元代—
文集 IV. ①K24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4538号

书 名 元史浅识

著 者 高荣盛

责任编辑 郭馨馨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桥北路京新村546号 邮编:210031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415 千字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335-4

定 价 40.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25—58849828)

前 言

一年前,南京大学民族研究所所长刘迎胜教授多次鼓励我,将数十年来发表的元史研究论文选收一集出版,以作为从事本职工作的一个小结。为促成此事,他还积极筹措出版经费。此次《元史浅识》的出版,全赖刘教授的竭诚操持,在此谨致谢忱!

本集收录论文二十余篇,按内容大致分为政治、社会生活、海外交通和社会经济几个部分,内容属唐、宋的三篇则另附于集后(以上内容在“目录”中以隔行的形式略予区分)。其中,《元代社会生活概观》是为《元朝史》(修订本)补写的内容。在这个领域内,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有史卫民先生的力作《元代社会生活史》问世,我之所以不揣鄙陋将之选入,意在用白描形式呈列自己对元代社会生活状貌的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同行,并祈待引起同好者对蒙古统治下的元代社会予以进一步关注。另一篇《元代“火室”与怯薛/火者/女孩儿》乃近期草成,尚未正式发表。鉴于这个问题涉及多个层面,情况较为复杂,故不敢贸然发出,乃将之列入集中,待吸收意见后加以修订,可能的话,再正式发表。

当就职以来对元代历史的一些看法集中呈现出来时,反倒有一种奇异的陌生感。这种“陌生”并非出自岁月的隔离,而是因集中比比皆是的错讹、失当而“不堪回首”。例如,首篇《关于蒙古征服动因及其“天下观”的思考》中,对成吉思汗及其蒙古征服评价的相关信息的把握便很有限,显得孤陋寡闻;文中引证的穆斯林作者术兹查尼的一段话(出自《捍卫者们史》,文中标为《纳西尔书》)乃转引自[法]雷纳·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但送稿后即查到该著

作的英译本(拉弗梯译《亚洲包括印度穆斯林王朝通史》,伦敦,1881年),惜未及替换,颇为遗憾。再如《元代祭礼三题》中关于金制品和鍍金、金铸佛像等内容,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但我的表达则显得简单、轻率。而《元大德二年的珍宝欺诈案》中对《史集》所载案件的告发者木黑必刺(解为木八刺或木八刺沙)和撒耳班(解为撒里蛮)的解读亦或更为轻率。至于立论、行文之失当,更是不胜枚举。所有这些,本拟借此机会予以修改,但举笔时,却发现讹讹之多,乃改不胜改。既然如此,最终只好处之以简,索性存其原貌;除明显而不得不改的讹误外(主要指错别字、明显的病句和注释的错误),内容一律不予改动。我们学历史的,自当尊重历史。自己发表过的文章是自己历史的一部分,存其原貌便是对历史的“尊重”——这也算是一种自我慰解之道吧。

其实,学术上,本人未入师门堂奥;所谓“成果”十分有限,研究所及亦非元代史的核心,故刊载的多属同仁刊物。集名冠以“元史浅论”,尚觉惶惑。在告别教学生涯之际,将此芜稿整理出来,也算聊胜于无吧。祈同仁批评指正。

选集的出版,民族研究所的杨晓春老师于中进行组织与促成。在读博士刘毓萱女士承担了文稿的收集、校对、电子输入等繁杂工作。凤凰出版社的郭馨馨编辑为编辑本集,特别是为选集在极短时间内的出版付出很大辛劳。在此一并致谢。

高荣盛

2010-8-5 于南京大学

目 录

关于蒙古征服动因及其“天下观”的思考	(1)
元大德二年的珍宝欺诈案	(20)
元沙不丁事迹索考	(49)
元代“火室”与怯薛/女孩儿/火者	(69)
元代祭礼三题	(99)
换盏醉饮与“蒙古式”宴饮礼	(114)
元代社会生活概观	(129)
古里佛/故临	
——宋元时期国际集散/中转交通中心的形成与运作 ...	(178)
元代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	(201)
Choncha 与马可波罗入闽路线	(217)
元代“舶牙人”通考	(230)
元代“倭寇”论	(247)
《郑和航海图》三议	(267)
元代海运试析	(285)

元代商人研究	(325)
元代畜牧业概观	(343)
元代匠户散论	(365)
元代江南官田	(378)
元代市镇管窥	(421)
宋代江苏境内漕运工程考述	(431)
隋唐时代阴山地区的室韦	(441)
乌介可汗“走依和解室韦”考	(454)

关于蒙古征服动因及其“天下观”的思考^①

成吉思汗初建大蒙古国距今已过去八个世纪,现今,人们对这位“世界征服者”和他的继承人的功业赞扬者有之,贬斥者也不乏其人。两者的共同点是对他们发动的征服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予以不同程度的谴责;不同点主要是,前者强调了征服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即打通地域阻隔而使东西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空前通畅的历史效应。近据所知,美国蒙元史专家杰克·威泽弗德著成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由《纽约时报》、《出版家周刊》和《华盛顿邮报》“隆重推荐”后,已译成中文出版发行^②,人们从书名就能大致了解作者的立意,这是迄今为止对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征服功业评价最高的著述;早先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等人主要围绕新发现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著成《文明之道》第五卷《蒙古帝国》一书,该书的评价中心可能在忽必烈时代^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贬斥者视成吉思汗等为冷酷嗜杀的暴君,一般舆论界甚至连同蒙古人和蒙古人建立的蒙元王朝在内,均斥之以杀戮、黑暗和倒退,而一些专业研究者则从历史的责任感出发,从这个世界性征讨的典型案件中引出警世之史鉴。我认为,形成这些迥然不

① 本文系教育部、财政部“985”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南京大学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项目子课题成果。

② 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温海清、姚建根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③ [日]杉山正明等:《文明之道》第五卷《蒙古帝国》,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4年版。

同的看法(主要指带有较明显偏失的看法)并不能一概视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要点是,这些看法仍然没有对耳熟能详的史实和相关的史料予以应有的认识和细究。关于成吉思汗等人的总体性评价已有许多中外论著予以发挥,本文在这里只是从有关的不同看法中感觉到,虽然有关史事记载(如下文提到的讹答剌事件)清楚表明了事实的真相,但由于受某种观念或某种研究模式的影响,有些论著或者将诸如讹答剌事件这样的史事置于不顾,或者轻言带过,或者在表述与此相关的历史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或看法,即认为随着蒙古势力的崛起,即便不产生这类事件,蒙古人西征和其他征服事件也必然会发生,区别仅在时间的迟早。因此,讹答剌之类的事件似乎可以作为一个耐人寻味的“节点”,以此类“节点”为视角,将问题集中到蒙古征服动因这个老话题上来,或许也能从一定程度上获得认识上的启发。



历史上农耕与游牧两大区域间的依存与对抗关系有其深厚的历史与社会生态学上的原因,汤因比等著名学者曾对此进行过阐释和分析,另一名法国亚洲史学泰斗雷纳·格鲁塞更是有针对性地说^①:

游牧生活实际上使突厥-蒙古人,对定居人民处于显然优势。游牧人——一般地说是骑马射箭者——具有流动性,几乎有到处皆是的神秘性。……如果细究中国的编年史,突厥-蒙古人的掠夺性入侵是经常性的,除在汉、唐全盛时期以外,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候,侵掠仅仅是侵掠,有如虫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如果机能有了

^① [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龚铎译,翁独健校,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页272。

毛病,这就是死亡。

根据上面的举证,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周期性的侵掠(和相应的定居人的反攻)是突厥-蒙古人和中国人关系的通常形式,而真正的入侵,即征服,只是例外的偶然事件,大约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它常常使征服者们自己不知所措。……

中国境内的游牧人与定居者周期性的对抗反映的正是某种历史的必然性。11—13世纪是内陆欧亚动荡的时代,这一动荡先后导致“漠北无王庭”和高原周边定居文明世界的衰落。动荡局面虽然成为东西交通的障碍,但对蒙古高原诸部族而言,则得以从东西方之间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为突厥语族诸部落和蒙古语族诸部落争霸提供了机遇,同时也成为高原再次统一的关键。无疑,由成吉思汗完成的蒙古高原的统一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是历史的巨大进步。金王朝是黄金家族的“世仇”,灭金甚至是成吉思汗的首要目标,这两点作为蒙古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或它们预设的目的,已毋庸置疑。灭南宋的情况似有不同。蒙古联宋灭金后,双方约定以陈州、蔡州为界,而宋端平元年(1234)六月,南宋却想趁蒙古大军北归之机“收复”河南,草率占领业已残破不堪的汴、洛两京,结果不仅大败而归,也让蒙古人以南宋“开衅渝盟”为借口,揭开了攻宋的战幕^①。格鲁塞曾将蒙古人的灭金即“前往征战的北京地区”视为“蒙古草原的延伸”(见后),但没有具体提到紧接其后的攻宋之战的导因。不过,在我们看来,战事的开启固然蕴含了农牧两大区域归于统一的内在必然性,但按照格鲁塞的分析,“端平入洛”则可能被视为“例外的偶然事件”。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对外征战的动因。首先是,成吉思汗的西征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例外的偶然事件”?

^① 事详《宋史·贾似道传》、《宋季三朝政要》,考述详陈高华《早期宋蒙关系和端平入洛之役》,载《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

二

讹答剌事件由花剌子模挑起,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伊斯兰史书如奈撒维《札兰丁传》、伊本·阿昔儿《全史》和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等出于各自的立场(偏袒或谴责花剌子模算端)而对花剌子模守将和算端的责任所记略有出入,但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无理杀害了成吉思汗的商队,侵吞了商队的所有财物^①。现在应该区分的是,如果蒙古人有意发动西征的话,那惨案或类似的事件正是求之不得的借口,但有关记载能不能透露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信息呢?不能。耶律楚材西行时得知,“西伐之意”是由讹答剌长官“杀大朝使命数人、贾人百数,尽有其财货”引发的^②。伊斯兰著作中,我们以《世界征服者传》和《史集》的记载为例,较详细地重温一下该事件的记载。前者以《征讨算端诸地的原因》为题所作的报道内容可大致分以下几个部分^③:

(一)、统一后的大蒙古国通过立法和创造优越条件保护商旅的权利——“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环境”,但因蒙古人不住在可供商旅汇集的城镇,“所以衣物在他们当中非常缺乏”,于是,“跟他们做买卖所得到的利益,人所共知”。基于这个原因,这位穆斯林作者便强调,“到这个时候,蒙古诸部大多数被成吉思汗所败,他们的驻地被毁,而且整个地区的叛乱也被肃清。所以成吉思汗在大道上设置守卫(他们称之为哈刺赤 qaraqchis)并颁布一条札撒:凡进入他的国土内的商人,应一律发给凭照,而值得汗受纳的货物,应连同物主一起遣送给汗”;“在那些日子里,蒙古人尊敬地看待穆斯林,为照顾他们的尊严和安适,替他们设立干

① 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142之注①。

② 耶律楚材《西游录》向达校注本,见中华书局1981年《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出版的《西游录·异域志》,页2。

③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90—92、95。

净的白毡帐”。

(二)、以质朴真诚优待前来的三位商人——因与蒙古人经商可获利,花刺子模的三个商人便收集了大量“他们认为适用的东西”后来到成吉思汗的驻地,第一个被引见的巴勒乞黑打开货物后,“对他最多用十个或二十个的那购进的织品,竟索价三个金巴里失”。以下让我们看看这位将要成为“世界征服者”的成吉思汗作出的反应:

成吉思汗对他的吹嘘很震怒,嚷道:“这家伙是否认为我们这儿从前根本没来过织品?”他吩咐把收存在他府库中前代诸汗所有的织品给巴勒乞黑看,籍没他的商货,作为赃物来分配,而且把他本人拘留。然后,成吉思汗派人把他的同伙叫来,连他们的货物也悉数送去。尽管蒙古人再三追问货物的价钱,商人们不肯讨价,倒说:“我们把这些织品献给汗。”这句话得到赞许,于是,成吉思汗叫每件织金料子付给一个金巴里失,每两件棉织品与撒答刺欺付一个银巴里失。他们的同伴阿合马也被放回,他的货物以同样的价钱被收购;对他们三人都优礼厚待。

(三)、组织商队回访——三个商人返回之际,成吉思汗命令他的儿子、那颜、将官,各从自己的部属中抽调两三人组成450人的穆斯林商队,每人贷给一个金巴里失或银巴里失作本钱,随三人至花刺子模,“在那儿作生意,收购奇珍异宝”,并致信:“你邦的商人已至我处,今将他们前往你邦,以购买你方的珍宝;从今后,因我等之间关系和情谊的发展,那仇怨的脓疮可以挤除,骚乱反侧的毒汁可以洗净。”

(四)、事件爆发——商队抵达边界城市讹答刺,该城长官亦纳勒术“起了谋财之念”,拘留全部商人后,派一名使者通报花刺子模算端。后者“没有稍加考虑”,“便同意要他们的命”,剥夺了他们的财物。《世界征服者传》记录成吉思汗虽狂怒而决意兴

兵，仍然派使者赴花刺子模交涉，“对他提出那件他本来无需干的背信事”，即“打算讨伐他”，随后又记道：“成吉思汗先派一个使团去见算端，警告他说，他决心讨伐他，报杀商之仇。因为‘提出警告者有理’。”另一部穆斯林著作《史集》对遣使前后的情况所作的记载可供我们进一步参证，其大意：野心勃勃的算端打算向东扩展，为探听蒙古实际兵力，派一使团来东方。成吉思汗接待使者后，随即表示友好意愿，并派使团携大量贵重礼品回访，转达愿与花刺子模算端缔结和约、建立贸易关系的旨意。此时，又是心怀鬼胎的摩诃末夜间单独召见蒙古使团的为首者询问成吉思汗兵力的虚实；商队被杀后，成吉思汗虽决意兴兵复仇，仍先派三使臣指责对方的背信弃义，要求交出凶手。这最后一道有可能缓解事态的 efforts 的结果是，摩诃末杀为首者，其余二人剃去胡须，逐出境外。

（五）、狂怒的成吉思汗痛心疾首，决意兴兵——得知 450 人的商队被杀（仅一人生还）后，成吉思汗因狂怒而几近失态（《世界征服者传》未及之处用《史集》略作补充）：

在这种狂热中，成吉思汗独自登上一个山头，脱去帽子（《史集》此后的文字：“将腰带搭在脖子上，光着头”），以脸朝地，祈祷了三天三夜（《史集》记：“他祈祷、哭泣了三天三夜”），说：“我非这场灾祸的挑起者；赐我力量去复仇吧。”（《史集》：“伟大的主啊！大食人和突厥人的创造者啊！我不是挑起这次战乱的肇祸者！请佑助我，赐我以复仇的力量吧！然后他感到了吉祥的征兆，便精神抖擞、愉快地从那里走了下来，坚定地决定将作战所需的一切事情部署起来。”）

我们在阅读穆斯林著述的时候，往往会因其叙事的故事性色彩而对事情的真实性和真实性产生一些怀疑，既然如此，我们不妨转引另一部穆斯林著述中透露的另一则记录，

看看能否作点印证^①：

据术兹查尼说，成吉思汗以惩罚了花刺子模的算端为自豪，这是一个真正的强盗，破坏一切法纪，命人在讹答刺戕杀他的使臣和商人，但是当他询问法官瓦亦哀丁不真吉，后世的评论如何时候，不真吉俯首思索，并应允作率直的答复，如果成吉思汗保证他的性命没有危险。得到这个保证之后，不真吉答道，后世没有人能够赞扬汗，因为蒙古人残破一切经过的地方。成吉思汗大怒，将他自己的弓和箭投在地上。在场的人都以为成吉思汗将要杀死这个出言不慎的人，不真吉自己也以为性命不保，但是这位征服者总是有自制能力，旋即怒解。少缓须臾，成吉思汗再对法官说，他的理解在表面上是对的，然而实际上是不知道真实情况。他附带说：“至于花刺子模算端，我要穷追他，至于他足迹所到，任何国家让他避居的我都要毁灭它！”

如所周知，生于伊朗的历史学家术兹查尼曾因躲避蒙古征服者逃到印度并客居德里苏丹国纳西尔·马哈茂德的宫中，《纳西尔书》是他用波斯文写成的通史型著作。作为当代人，术兹查尼所讲到的蒙古征服的历史应该是有根据的。由此可见，成吉思汗与法官的这段对话与上面的《世界征服者传》、《史集》和耶律楚材的记述前后呼应，一脉相通，从而可以使我们断定，讹答刺事件的挑起者的行为是如此地极端，以至超越了常人可以容忍的“底线”；退而言之，如果450人被视为“间谍”尚可作为杀商的借口的话，那么，成吉思汗发兵前再一次遣使要求引渡直接挑衅者的努力仍被回应以杀戮和污辱，就只能说明兵戎相见的不可避免，从而导致成吉思汗在以更残酷、更血腥的手段进行复仇的进程中，仍然对算端等人的恶行耿耿于怀和愤愤不平，他要“穷追”

^① [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第三章第十三节后注[2]，页376。

算端的宣言,也以哲别和速不台为首的先锋部队的奉命追击而得以印证和实现。由此,我认为格鲁塞对西征起因的一段评说是公正的:“不管后来蒙古人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多么残酷,我们都不应该忘记成吉思汗的商人被屠杀、使臣被杀害而又得不到任何解释的事件在他心中点燃的熊熊烈火,这种怒火的升起是可以理解的。”^①不仅如此,让成吉思汗对是否发动西征作出判断的还有一层重要理念,即内外有别的理念。

如前所述,成吉思汗派 450 人的商队出发时还附上一封给算端的信件,其中所谓的“你邦的商人已至我处,今将他们前往你邦”便十分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清晰的理念,它使我们感到,作为蒙古高原的主人和金王朝的一名地方官员以及以血亲复仇为天职的成吉思汗,他可以理所当然地统一了蒙古高原并毫不留情地对“世仇”金王朝大张挞伐,但面对算端不可容忍的挑衅行为,他仍然清楚地认识到,花刺子模是“你邦”,是一个与大蒙古国平行的外部世界。的确,在处理与花刺子模通商和讹答剌冲突时,成吉思汗正是按照这个立场行事的。格鲁塞正确地说:“在成吉思汗的一生中,对花刺子模的战争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在对花刺子模的战争开始以前,他几乎还没有走出蒙古的范围,因为他曾前往征战的北京地区在当时还是蒙古草原的延伸。现在,他将进入伊斯兰教盛行的土地,进入一个未知的世界。统治着突厥斯坦、阿富汗和波斯的花刺子模帝国苏丹的势力似乎是很强大的。实际上,花刺子模帝国苏丹的军队在数量上要比成吉思汗的军队占优势。”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另一个细节是也遂的进谏——亦如所知,发兵前由也遂的提议而使窝阔台被选为成吉思汗“百年之后”的接班。这个大胆而多少显得有点突兀的提议说明什么?是仅仅因也遂貌美受宠,所以才敢于作如此进谏?还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的质朴豪爽,因而没有其他文明国度那种不可“犯上”的法规和惯例?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在这一点上,可能还是格鲁塞说得对:这个情节恰恰证

^① [法]勒内·格鲁塞:《成吉思汗》,页 315。

明,“当时即使是在成吉思汗周围的人中间也存在着一种无法掩饰的不安情绪。他的宠妃之一美人也遂的进言就表明当时的确普遍存在着这种不安”^①,即进入一个未知世界、吉凶不可逆料而笼罩在“车帐如云,将士如雨;马牛被野,兵甲赫天”(耶律楚材描写西征军语)的西征战团中的不安。如果以上分析能够成立,那么,它们可足以说明,成吉思汗的西征是与蒙古的统一、征金等东面战场起因不同、性质不同的战争;西征不久蒙古军显示的所向披靡并不能反证战前成吉思汗自视胜券在握。我想表达的看法是,成吉思汗决策发动西征不是傲视一切的轻率之举,更不是主动的、预设的、因强大而必然发动的征服之战。恰恰相反,它是一场被迫挑起的、对一个“未知世界”的复仇之战。

三

我们肯定成吉思汗的西征是花剌子模挑起的、以成吉思汗复仇为主要动因的偶然事件,这也是惨案爆发至西征进行到相当一段时间内支配成吉思汗的主要意念,成吉思汗作为“世界征服者”的形象正是在偶发的被熊熊烈火点燃起的复仇之战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②。不过,西征进程的推进虽大大拓展了成吉思汗的视野,但在六盘山下含未酬之志倒下之前,他眼中的世界也只是“从海押立和花剌子模地区,延伸到撒哈辛及不里阿耳的边境、向那个方向

① [法]勒内·格鲁塞:《成吉思汗》,页316。

② 血族复仇是蒙古等民族盛行的传统习俗之一,这一点在成吉思汗身上表现得似乎特别强烈。拉施特所记录的成吉思汗与爱将和诸子的那段著名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对话或许正是他战胜强敌和复仇成功后获得的内心感受:“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的美貌的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才是男子汉[最大]的乐趣!”见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362。

尽鞑靼马蹄所及之地(赐给术赤的封地)”^①。成吉思汗的重要意义是,由花剌子模算端挑起的、以黄金家族复仇为起因的西征既然进行,蒙古军就很快显示了他所向披靡的威力而一发不可收拾,并作为一个强大的惯性,在成吉思汗身后相沿下去。此后的征战虽然也有其直接的导因,但与当初显然不同的是,征战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展开的,是主动的、预设的行为。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征讨,原先“鞑靼马蹄所及之地”的状貌很快清晰起来,从亚洲进入东欧,又逐步展开了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直接交往。更令人惊叹的是,从1206年到忽必烈灭南宋,成吉思汗祖孙三代征战七八十年,向东实现了对汉地的大一统,并展开了向海外的征战。可以说,“世界征服者”这一完整概念的实现者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不过,“世界征服者”这一桂冠并不是后人的赠予,而是通过征战自视登上世界权力之巅的蒙古贵族的确切的自我认知。当初,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而被授予“成吉思汗”名号时,按晃豁坛巫师阔阔的宣解,铁木真理所当然地是一个“普天下之汗”。迨至贵由,他的自称是“大民族全体之海内汗”和“大蒙古民族之海内汗”,忽必烈时或称“普天下之汗”,末帝妥懽帖睦尔或称“众皇帝之皇帝”,等等。可以想见,成吉思汗的后继者们所使用的名号的词义与乃祖虽无实质差异,但其历史内涵与自我感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些通常呈现在信件和诏令中的自称往往伴以征服者们俯视万邦的口吻,动辄以“长生天之训言”即“成吉思皇帝圣训”的名义命令对方“称臣”、“来朝”、“臣服”或“效忠”^②,尽管这类“大而空”的命令在多数情况下并未赢得相应的回报。现在让我们侧重分析一下大元帝国的缔造者忽必烈的“天下观”及其征伐海外的动因。

元朝建立后,汉地纳入蒙古帝国的版图,其疆域名义上应包括

① [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传》,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43。

② 详[法]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中华书局《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2001年版。顺帝诏书见瓦丁《方济各会年鉴》著录;另见《高丽纪事》(仓圣明智大学刊本)诸籍。